

台灣及東亞青少年的成長歷程： 評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ast Asian Youth*

關秉寅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及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位學程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ast Asian Youth，伊慶春主編，
Dordrecht: Springer，2013年，345頁。

1989年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刊登了美國社會學家 Sanford Dornbusch 所寫 “The Sociology of Adolescence” 一文。此文開宗明義指出，長期以來，針對青少年的研究，往往是在發展心理學的領域 (Dornbusch 1989)。就以美國社會學界言，雖然如 James Coleman 於 1960 年代就對青少年在學校生活中發展出來的文化有深刻的著墨 (Coleman 1961)，但社會學家後來投入此領域的仍然有限。即使投入的話，社會學家也往往是延續 Coleman 的啟發，將研究侷限在學習成就或偏差行為這類的議題上。當 Dornbusch (1989) 回顧 1980 年代青少年研究之發展時，樂觀地指出青少年研究已有從心理學對青少年個人發展任務的關注，轉向以脈絡觀點探討青少年個人身心發展與其環境間互動之趨勢。這些脈絡自是包括了家庭、學校及同儕。因此，Dornbusch 呼籲更多的社會學家投入此領域研究。

就如 Dornbusch 所樂見的，自 1980 年代以後，美國的青少年研究明顯的強調有廣泛脈絡觀點的理論典範，如人文生態論 (human ecology) 及生命歷程 (life course) (Crosnoe and Johnson 2011)，同時也發展出呼應這些理論典範的長期追蹤資料，如：National Longitudinal Education Study of 1988 (NELS:88)、National Longitudinal Survey of

Youth (包括 NLSY79、NLSY97)、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Adolescent Health (Add Health)及 Education Longitudinal Study of 2002 (ELS:2002)等。有此類可供青少年研究的大型長期追蹤資料，除了美國之外，如英國 1958 年就開始建立 National Child Development Study，1985 年則有 Youth Cohort Study，近期則有 Millennium Cohort Study 及 Longitudinal Study of Young People in England；加拿大於 1994 年建立了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ren and Youth，其後又有 Youth in Transition Survey。

二十世紀末，前述少數歐美國家在青少年研究理論及經驗研究的長足發展，終於引起東亞社會學界的注意，其中又以台灣為先行者。2000 年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先後發動了兩個與青少年長期追蹤研究有關的計畫。作為先驅的就是由伊慶春教授等人組成團隊所啟動的「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簡稱為 TYP)，本文所評論的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ast Asian Youth* 可說是此重要先驅計畫向國內外正式發表的一項成果報告。當時中研院社會所發動的另一個大型長期追蹤計畫，是由張荳雲教授領導建立的「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Taiwan Education Panel Survey，簡稱為 TEPS)。雖然這兩個大型長期追蹤計畫規模不同，也各有其目的及特色，但作為 TEPS 計畫的核心參與者，我很慶幸能從 TEPS 計畫初期，一直到 TEPS-B (即 TEPS 近期的後續調查)都可以參考 TYP 這先驅計畫的一些經驗。

TYP 計畫團隊的努力及研究成果，最近在伊教授為主編的領導下，由 Springer 出版了 *The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of East Asian Youth* (2013)專書。從書名可知這本是以分析 TYP 資料的研究發現為主的專書，還包括了南韓、中國(上海)及香港三個東亞地區青少年研究的三篇論文。伊慶春教授在首章導論即指出，現今以台、中、港、韓等為代表之東亞社會的青少年在東西文化交流下，面臨傳統與現代、保守及開放等對立價值或作為的雙重衝擊，而且他們的學校或家庭環境脈絡，也有不同於西方歐美社會之處。以家庭制度為例，在儒家文化

的影響下，東亞社會仍有一定比例的三代同堂家庭型態，其青少年也還相當程度保有核心的家庭倫理觀念，如尊重長輩、順從權威等。在教育制度方面，東亞青少年普遍面臨高教育期待與競爭性入學考試的壓力等。在這種社會文化條件下，學界對於東亞社會青少年的發展軌跡缺乏研究及瞭解。因此，本書的出版自是對此領域發展有開創性的貢獻。

首章導論也清楚地界定本書研究的對象，涵蓋了從青少年早期（13 歲左右）至成年初期（22 歲左右）的年輕人，其關心的主題—*psychological well-being*—則是廣泛地包括了發展過程的各個面向，如親子關係、友誼網絡、偏差行爲、心理健康，以及教育成就等等。對於未來希望能使用 TYP 長期追蹤資料的研究者言，透過首章的說明，可清楚瞭解 TYP 的樣本及研究設計。TYP 從 2000 年起同時開始長期追蹤調查 2,696 名七年級生（以下簡稱 J1），以及 2,890 名九年級生（以下簡稱 J3）兩個不同年齡組國中生成本。這些學生分屬於當時台北縣市及宜蘭縣的 40 所國中的 81 個班級，使 TYP 的國中生樣本具有多層次的特色。至於以七年級生及九年級生這兩個年齡組爲 TYP 長期追蹤研究起點的考量，雖然首章對此並無進一步說明，但應該是因爲此種設計可以在兩三年內同時瞭解青少年在國中時期，以及國中升學到高中職後的發展情況有關。

TYP 另一特色是使用自填問卷、電訪及面訪等各種方式，達成其青少年受訪者是每年都追蹤調查的目的。至 2010 年爲止，J1 樣本已經完成了 9 波的調查，J3 則完成了 8 波的調查。此外，調查對象除了前述的學生樣本外，這些年來，TYP 也透過各種方式調查了多波的學生家長及老師，以瞭解這些學生及其家庭與學校的情況。相較於 TEPS 爲全台灣地區的代表性樣本言，TYP 樣本或只能代表台灣北部地區，但也正因爲其較小的樣本規模，使其得以有每年追蹤的豐富資料，成爲其與 TEPS 相異的特色之一。

除首章導論外，其餘十四章由 17 位台灣學者，以及日、韓、中國大陸學者撰寫，編排在 Family Context、School Context、Entering

into Adulthood，以及 East Asian Additions 等四個主題中。前三個主題內的十一篇論文均為分析 TYP 資料的研究成果；與家庭及學校環境脈絡主題有關的六個篇章，均是分析 J1 樣本；與進入成年期有關的五個篇章中，有兩篇是分析 J1，其餘三篇則是使用 J3 樣本。這些論文共同的特色是一方面與一般研究者熟悉之社會學或社會心理學領域的相關重要主題有關，但另一方面則企圖凸顯在台灣社會文化脈絡下特有的現象及發現。

以編排在家庭環境脈絡的論文為例，吳明燁教授探討台灣父母管教方式對親子關係影響的論文，即強調「管教」是華人社會教養子女的特有文化概念。相對於西方社會父母注重以子女為中心，比較寬容的教養方式來說，華人社會則認為父母要「管教」小孩才是真正地關心子女。TYP 也因此發展出了符合此管教概念的測量問項。這些問項可歸類成 parental accommodation 及 parental governance 兩個面向。前個面向的題項包括如父母是否為子女升學而減少自己看電視或社交時間，後個面向則是對國中子女生活作息的限制性安排，如減少看電視或出遊玩樂時間。透過潛在類別分析的結果，區辨出了 hands off、affectionate、restrictive 及 intensive 四類管教方式。透過 J1 國三及高三兩時期的比較，父母管教方式可看出是從比較嚴格到比較寬鬆。此外，多元迴歸分析也顯示這四類管教方式對親子親密或衝突程度是有影響的。比較令人好奇的是，這四類管教方式雖可能與過往或西方學界發展出來的不同，但因沒有做比較，所以無法判斷此處的台灣父母管教方式與過往教養類型之間的關係為何，以及對青少年發展的影響是否不同。

另以學校環境脈絡相關的論文為例，TYP 蒐集了包括參加補習之年級、科目數和花費等詳細資料。章英華教授即根據 J1 從國一到高三與補習相關資料，非常詳細地分析了此一被視為具有東亞社會特色的課後補習及輔導的現象。章教授的研究發現固然有不少是大家可預期到的，例如補習數學的比例最高，其次是英文。又如為了應付升學，國三學生平均補習的科目數比國二增多，或是高中職的分流使得就讀

學術學程參加補習的比例遠大過職業學程學生。其分析也可看出是否參加或繼續補習會受到家庭社經地位、升學高中職之期望，以及居住地區都市化程度等的影響。但是此論文也發現了一些比較不為大家所預期的現象，例如，或許因為國三時參加學校課後輔導比例的增加，國一生參加補習的比例比國三來得高。此外，宜蘭縣都市地區學生參加補習的比例高過台北市一些地區，其鄉村地區學生補習比例也遠高過台北縣的鄉村地區。

東亞社會中小學教育制度的另一特色，是學生往往與同樣一班同學一起上所有課程，因此同班同學間可建立特別屬於班級層次的同儕關係。本書第五及第六章即利用此特色分別探討國中生偏差行為及其班級同學偏差行為的關係，以及國中生友誼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之成因及對學習表現和心理健康的影響。第五章的研究利用了台灣國中生此一特色進行多層次的分析，探究班級與學校這兩個層次脈絡中青少年個人偏差行為的情況。此研究顯示國中一年級生（亦即七年級生）的偏差行為的程度只會受到其班級偏差程度的影響，學校層次偏差程度則無影響。這項研究自是展現了TYP資料可以進行較複雜之多層次分析的特色。比較可惜的是，此處分析只用到了同一年級的資料，故其發現無法清楚區辨偏差行為究竟是受同儕影響，還是受到學生自我偏差影響。

第六章關於友誼結構洞的研究，簡言之，即為了解學生個人與其他班上同學間建立之友誼網絡的開放或封閉程度。友誼網絡較開放者，則學生受到屬同網絡朋友期待或要求的限制就比較小；反之，則比較大。此研究使用了國中時期三波次調查的資料，來瞭解學生友誼網絡結構開放性程度的變化及其影響。此研究國中時期男生的友誼網絡比較開放，女生則比較封閉，這與過往青少年友誼關係的研究發現相同。此研究也發現與父母及老師關係較好者，其友誼網絡的開放性也比較大，以及友誼網絡開放性較大者，對自我各方面的評價也比較高。此研究也藉由學生自我友誼網絡開放性較高者，學習成就比較好這一發現，企圖與 James Coleman 之社會資本學者所主張之代間網絡

封閉性的理論對話，進而認為代間網絡封閉性或社會資本的效果，是要透過學生自己的社交技能，以及作為結合代間溝通橋樑的理性計算。換言之，此研究想強調我們需要進一步瞭解青少年自我能動性與代間網絡結構限制性間的互動的關係。我想不論此研究的發現是否有足夠證據支持其主張，其與既有主流理論觀點對話的企圖心是值得讚揚的。

本書第三部份與進入成年期主題有關的論文中，有兩篇是用 J1 樣本，三篇用 J3 樣本。此部分幾篇論文特色或是使用更多波次資料，或在分析方法上用了更進階的統計分析方法。以分析方法言，如第 8 章探討教育分流對 J1 青少年樣本長期心理健康的影響時，使用了潛在成長曲線的模型。第九章探討 J3 樣本就學或就業對於心理健康的影響，以及第 12 章分析 J3 樣本之自尊與偏差行為間長期的關係時，均使用了隨機效果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以企圖控制未觀察到變項(unobserved variables)對解釋變項影響力的估計偏誤等。在與「轉大人」有關的主題上，除了與進入勞力市場有關如尼特族(NEET)或作為重要成人指標之是否離開原生家庭的議題外（見第九章及第十一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第十章對影響婚前親密行為態度的探索。此一由喬芷及伊慶春兩位教授撰寫的論文應該是使用 J1 及 J3 兩樣本分別於 20 歲面訪調查時蒐集到的資料。依據此資料顯示，大部分男女青少年認為只要兩情相悅，親吻是可接受的行為，也有超過五成同意或非常同意愛撫是可接受的。至於婚前性行為，則男女顯然有別。男性超過五成同意或非常同意可有婚前性行為，但只有約略過三成女性同意或非常同意。如果將有些同意(slightly agree)也當成是認可的話，則不論男女性，對這三種不同程度之親密行為的認可會更高。喬、伊兩位進一步分析顯示，家長的管教是否嚴格，以及好朋友有性行為經驗者的比例等，均會影響到青少年本身對婚前性行為的態度。此篇論文有其特殊意義與價值，因為一來過往台灣類似的研究並不多見，二來則是個資法通過後，未來可能也不太容易蒐集此種資料了。

本專書最後一部分是由三篇探討南韓青少年、外地農民到上海打

工的子女 (migrant children)，以及香港 1980 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或調適的論文所組成。這三篇論文雖無法像專書其他論文那樣深入，但也各有特色，可讓讀者一窺東亞這三個地區青少年在面臨家庭、學校，乃至於整個社會的壓力下的情況。以 Sun-Young Ahn 與 Hye-Jeong Baek 兩位南韓 National Youth Policy Institute 的學者撰寫論文為例，他們從家庭、學校及課後學習等三方面，以 Korea Youth Panel Survey 及 OECD 等資料，對於南韓青少年普遍面臨家庭及學校極高的學業成就期待，以及感受到之壓力間的關係，做了相當簡要但清楚的介紹。閱讀此篇論文時，我最大的感想之一是，因台灣在國際上的孤立，使得目前蒐集到與青少年有關的各項統計，大多無法與國際直接做比較，因而無從瞭解台灣與其他國家的異同。如 Ahn 與 Baek 的論文即指出，南韓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在一項南韓、日本及中國的比較中顯示，南韓青少年的快樂程度在此三國中是最低的。此外，與 OECD 的國家比較，南韓的青少年在教育、生理健康及安全等面向都有高分，在物質生活、家庭及同儕等面向則屬中等，但在主觀心理面向（生活滿意度）則屬最低。台灣的青少年呢？我想台灣目前的國際困境，不該是我們不去留意國際間蒐集相關青少年基本統計的藉口。我們反而應該努力留意這類統計的蒐集，讓台灣能夠透過國際的比較，使其他國家的學者瞭解台灣青少年的境況，並因此而感興趣作比較研究。

至於上海及香港兩地區論文的加入，可說是讓此專書具有兩岸三地華人社會青少年研究的特色。上海地區的論文是針對八百多位由內地移民至上海之移工家庭四年級到九年級青少年心理調適的研究，特色是聚焦在瞭解家庭、學校及社區之社會資本，以及青少年自己主動和父母、老師與鄰居互動、建立更強之社會資本等對於他們心理調適的影響。這個瞭解青少年本身主動性可能帶來的正面影響，是青少年研究不常注意到的面向，也是這個研究的特色。最後，香港地區的研究特別聚焦在 1980 後的年輕世代，因為這個年輕世代似較先前的世代更熱衷於各項社會及政治運動。香港傳媒認為此乃肇因於此世代社會流動的機會減弱，導致無力感及挫折感增加。台灣年輕世代可能對

此描繪也是心有戚戚焉。葉仲茵(Chung-Yan Ip)及吳曉剛(Xiao-Gang Wu)兩位香港學者即以 2007 年的 *Social Inequality and Mobility in Hong Kong* 調查資料，檢視香港不同世代對於一般生活、香港政府經濟政策、管理能力、民生政策、環境政策、教育政策的滿意度，以及主觀社會地位等是否有所差異。他們的研究發現 1980 後的世代的確比較不滿意一些政策面向，但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們也發現相對於較年長的世代，1970 及 1980 年代出生的世代反而會覺得香港是一公平的社會，且香港經濟不是為大企業所壟斷。換言之，對於生活或政策的不滿意並不一定會轉化成政治或社會運動的力量。這種與公民社會相關的研究議題，自是台灣青少年長期追蹤調查研究未來需要關心的項目。

整體言之，伊慶春教授編著的這本英文專書是台灣青少年研究的重要里程碑。雖然，此專書有其限制或缺點，例如大部分論文未能進一步處理長期追蹤後樣本遺失的問題，或部分論文使用的分析方法可能有問題等。又或本專書雖以東亞社會青少年研究為名，但卻缺少如日本此一重要社會青少年的論文等。但瑕不掩瑜，此專書一方面讓國際學界瞭解台灣及東亞社會在此研究領域的成就，另一方面則讓未來有興趣於進一步分析 TYP 資料者，或跨社會比較青少年者，一個很好的啟發。至少，以我自己參與的 TEPS 資料庫的建構來說，我也希望我們的團隊能以 TEPS 及其後續調查的資料為基礎編著類似的專書。相信在這些與年輕世代有關之長期追蹤資料庫的基礎上，未來台灣學界在此領域的發展將可與國際並駕齊驅。